

#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 陈宝良 著

中华学人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 陈宝良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陈宝良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21310-8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6648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

MINGDAI SHIDAFU DE JINGSHEN SHIJI E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30 mm×980 mm 1/16

印 张: 36.75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

策划编辑: 谭徐锋 宋旭景 责任编辑: 齐琳 林艳辉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民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 目 录

导 论 .....	1
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	3
二、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 .....	51
三、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 .....	83
第一章 君子小人之辨 .....	159
一、引 言 .....	159
二、从道德人格看君子小人之辨 .....	161
三、从政治人格看君子小人之辨 .....	177
四、君子、小人之辨的历史转向 .....	185
五、结 语 .....	206
第二章 出处仕隐的困惑 .....	217
一、引 言 .....	217
二、出处进退：士大夫的“大闲” .....	219
三、仕抑或隐：士大夫的困惑 .....	227
四、出处仕隐观的新动向 .....	237
五、出处仕隐：士大夫的抉择 .....	250
六、结 语 .....	279
第三章 忠孝节义的两难境地 .....	284
一、引 言 .....	284
二、士大夫的忠孝观及其转向 .....	288
三、士大夫的节义观及其转向 .....	307
四、士大夫忠孝节义的行为实践 .....	331
五、结 语 .....	359

第四章 生死之间的抉择 .....	365
一、引 言 .....	365
二、生死观：儒佛道之辨及其合流 .....	367
三、士大夫的生死观及其转向 .....	378
四、士大夫面对生死的行为抉择 .....	392
五、结 语 .....	406
第五章 雅俗之辨及其互动 .....	409
一、引 言 .....	409
二、雅俗之辨：雅与俗的两分 .....	410
三、雅俗互动态势的形成 .....	415
四、士大夫的崇雅意识及其精致生活 .....	423
五、结 语 .....	451
余 论 .....	452
一、明清易代与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 .....	452
二、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及其心理分析 .....	488
三、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 .....	525
参考文献 .....	549
一、古代典籍 .....	549
二、近人论著 .....	567
后 记 .....	582

## 导 论

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不但丰富多彩，且极具变化。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如此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动，引发了众多学者关注明代历史的兴趣。他们将自己的观察点落实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晚明时期，深入其中，进而考察其基本的变化，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如余英时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sup>①</sup>周启荣认为，16世纪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吊诡。其具体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诸如城市化，城市文化的繁荣，教育机会与识字的增加，城居地主的出现，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束缚的衰落，<sup>②</sup>等等。俄国学者沃斯克列辛斯基对17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认为，17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这是一个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内具有显著转型特征的时代，一个因哲学、宗教、科学和道德等诸多传统观念发生危机而亟待重新估衡的时代，一个为寻求通向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新途径而痛苦反思的时代。<sup>③</sup>

毋庸讳言，由于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对这一段历史如何认知乃至定性同样存在着差异。如金克木通过中、西比较，对明代思想、

---

① 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载余英时等著：《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3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

② 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

③ [俄] Д. Н. 沃斯克列辛斯基著，汪涌豪译：《李渔的伦理哲学观》，载朱立元、裴高主编：《中西学术》（二），395~396、41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文化的近代化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明代经济虽有发展，民间文化虽很热闹，但商品流通不畅，文化控制不衰，不可能出现欧洲同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变革。他进而认为，明代还没有产生近代欧洲的个人人格理念和理性观念。从思想到知人论世、处理事务，还是惯于判断而不惯于论证，论证也往往是因果二段式、问答式，不是推理式。零星的思想火花各代都可以有，不能发展为文化思想。个人的享乐不等于“个人主义”。自私不等于“人权”。中国的文化史上没有出现欧洲的近代。<sup>①</sup> 这一论断，尽管亦可以视为一家之言，但有下面两点值得商榷，并进而引发讨论：一是作者或许对欧洲有充分的了解，但对明代社会、文化显然缺乏有深度的掌握，从作者仅仅简单举出王阳明、李贽、朱载堉、李时珍、汤显祖、徐霞客、黄宗羲、王夫之这么几个有名头的人物，可知作者尚未深入到明代史的深层。若是借此简单地论定明代商品流通不畅，文化控制不衰，即使不能遽判为武断，但说其对多年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或文化史学者成果的不尊重，则并不为过。二是这一论断，不可否认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影子，于是在对待中国独特的近代化道路的问题上，不免戴有一副有色的眼镜。

这就涉及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认识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研究，必须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坚持此论且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数沟口雄三与塞普拉（Cipolla）。沟口雄三的中国近代社会观，建立在以下两个新的观察中国的视野之上，以保证对中国近代化的考察不再带有主观片面性，而使其更加客观化。这两个新观点是：一是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视野（他把太平天国时期以后的所谓革命路线纳入范畴）向前推至前近代期，建立一个综合的或长期的视野，重新确立一个新观点，借此以俯瞰、推敲中国革命；二是反对把欧洲近代视为普遍性的价值基准以及一元性地归结到欧洲，而是具体考察中国（还有日本）各自的近代，如何以各自的前近代为基体，又如何借助这个基体表现出（纵使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上）

---

<sup>①</sup> 金克木：《文化之谜：科学、哲学、艺术》，载氏著：《百年投影》，41、45~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的相对的独立性。<sup>①</sup> 又根据塞普拉的观点，确定工业革命在任何国家的确切日期，一如确定中世纪或近代的开端，无疑是一种武断的做法。换言之，工业革命或者说近代化的来临，是一个在观念、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诸方面上发生综合变化的渐进过程。<sup>②</sup> 两者所言，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性且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且对于重新认识明代社会多有裨益。

有鉴于此，作者选择明代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这一特殊时期，以士大夫这一社会阶层为个案，并通过士大夫阶层的观念与价值体系的转变历程，借此阐明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渐进乃至复杂。

## 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其源起究竟是在何时？若广泛网罗明朝人的记载，基本可以证明成化、弘治年间是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滥觞。

首先，从社会风俗上来看，成化、弘治时期，无不被明代的方志作者以及其他著述者视为风俗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社会风尚的变化，显然应该是社会、文化变化最为直接的反映。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异，有的学者主张滥觞于嘉靖年间。<sup>③</sup> 然查阅明代典籍，尤其是大量的方志，则与此说稍异。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异，早在成化年间就已开始。如成化时九卿以灾异陈言，其中一项就提及，当时“军民服色器用，

<sup>①</sup> 关于沟口雄三中国近代社会观的评述，参见李焯然、陈宝良等：《传统的开展与再生——沟口雄三的中国近代社会观评析》，载《明清史集刊》，第7卷，261~282页，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2004。

<sup>②</sup> 关于这一观点，可参见 Chris Bramall and Peter Nolan: "Introduction: Embryonic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in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 (eds.), Li Zhengde, Liang Miaoru and Li Siping (tr.), *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 xvi.

<sup>③</sup>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又收入氏著：《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114~132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近多僭越，服用则僭大红织金罗缎遍地锦，骑坐则僭描金鞍□鍍银鞞辔，首饰则僭宝石珠翠”；<sup>①</sup> 江苏江阴县的风俗变化也始于成化以后；<sup>②</sup> 又如浙江新昌县的风俗之变，同样肇始于成化以后。<sup>③</sup> 但一般是出现于正德年间，如宁夏、四川的洪雅县等。<sup>④</sup> 从明末清初人宋应星、顾炎武、叶梦珠等人对成化、弘治时代的过分缅怀不难看出，成化、弘治时代，仅仅是明代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滥觞，而真正发生急剧变化者，理应是在正德年间。<sup>⑤</sup>

其次，从文风、学术来看，明代的许多学者、文人亦无不将成化、弘治前后视若井然有别。黄佐就亲自记录了这种前后变化过程。他认为，在成化以前，风俗朴茂，即“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学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惟恐伤之”。以此发为文辞，尽管辞藻并不华丽，但无不“根于理质”，因此气象“霏然以昌”。<sup>⑥</sup> 明末人许孚远对明代学术变迁大势的描述，大抵可以作为黄佐之说的注脚。他认为，从明初以迄弘治、正德年间，朝廷崇尚“正学”，尽管当时的学者“稍滞旧闻，不达天德，拘固支离，容或所不免”，但确乎“人才彬彬”。自“江门”（指陈白沙）、“姚江”（指王阳明）之学相继而兴，虽属补偏救弊，但最终导致学术风气大变。一至两派之末流，更是“始于怪僻，卒于悖乱”。<sup>⑦</sup>

进而言之，在明代中期开始的这场文化变革中，思想文化渐趋活跃，按照董其昌的说法，当以王阳明、李梦阳作为开创性的人物。董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5，2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嘉靖《江阴县志》卷4《风俗记》第3，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③ 万历《新昌县志》卷4《风俗志》，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④ 嘉靖《宁夏新志》卷1《风俗》；嘉靖《洪雅县志》卷1《风俗》，均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⑤ 关于明代社会风尚研究的评述，可参见林丽月：《世变与秩序：明代社会风尚相关研究评述》，载台北《明代研究通讯》第4期（2001年12月），9～19页。

⑥ 黄佐：《眉轩存稿序》，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39，24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⑦ 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79～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其昌对明代学风的变迁，有一段颇具卓见的论述：

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北地犹寡和，而东越挟勋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几为摇撼。<sup>①</sup>

这种正德前后思想文化的变异，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向所能制约，而是时代变化的趋势所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王阳明、李梦阳在改变整个明代学风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董其昌的论说堪称真知灼见。

事实确乎如此。就明初文化而言，由于朱元璋一统天下，重新建立了统治全国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对思想文化的钳制极为严厉。与这种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崇程朱理学，处于一种“述朱”时期，毫无个人的新颖发挥。有人曾这样记述明初思想界的状况：“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sup>②</sup>这就造成了明初“有质行之士，而无同异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颢门之学。”<sup>③</sup>尊崇固有的伦理规范，亦步亦趋，这在传统的道德之士看来，堪称“质行之士”。在文化专制强盛的时代，“共学之方”是文化保守最显著的表现；一旦出现“同异之说”，设立“颢门之学”，就表明文化剧变行将来临。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深入地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一原则出发，大抵可以将正德时期（1506—1521）视为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随着社会的变异，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思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趋向革新、活跃。换言之，明代社会与文化在正德前后呈现出两种迥然

① 董其昌：《容台文集》卷1《合刻罗文庄公集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② 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上》，明崇祯间刻本。

③ 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上》。

不同的特色。<sup>①</sup> 基于此，将正德年间定为明代社会、文化的分水岭，大抵符合历史的实际。

那么，正德以后的这段明代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认知？毫无疑问，这段历史大体上与晚明史重合。而对晚明社会、文化的判断，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晚明是一个社会生活结构发生普遍变化的时代，而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的商业化所促成的。<sup>②</sup> 对晚明的研究，可以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一把“钥匙”。<sup>③</sup>

### （一）社会转型

自正德以后明代社会的转型，体现在各个方面，诸如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等。

#### 1. 经济结构的转向

明代社会转型明显之处，首先出现在经济上，这就是有了兴旺繁荣的商业与工业经济。关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问题，这是中、西方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自1950年以后，关于中国近代早期，也即从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英文出版物无疑有了较大的增加。毫无疑问，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传统经济证据的选择与解释，在19世纪时深深受到欧洲自己的动态进程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又深深受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影响，受到诸如对中国语言的无知，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的混乱，以及1949年以后与中国文化的长期隔离的影响。而在中国国内的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研究，其观点显然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1949年以前，受到了剧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1949年以后，

<sup>①</sup> 相关的阐述，可参见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1~2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sup>②</sup>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93), p. 3.

<sup>③</sup> Joanna F. Handlin: *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 The Reorientation of Lü 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x.

又受较多的学术自由被限制的影响。于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下面这样一种比较认同的观点：如果说1840年以前，中国经济已处于一种独立的近代工业化的边缘，那么，1840年以后，西方的“挑战”就会被视作一种对中国经济的毁灭。自1980年以后，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对中国经济史的普遍看法，这就是在10至14世纪，中国经历了一次“中世纪的经济革命”。但在随后的蒙古族统治下，以及明初的“控制经济”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遭到了挫折。但经过随后几个世纪经济的持续发展之后，到了晚明，在中国经济领域又出现了“第二次商业革命”，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sup>①</sup>

## 2. 政治结构的变化

明代政治结构的变化，发轫于政治氛围的相对宽松以及言论的相对自由，随之而来者，则是社会组织的进步，民间力量借此广泛兴起。

当明初之时，政治钳制相当严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采取重典政策，导致当时官民对朝政无不噤若寒蝉。

尽管明代法网严密，但即使在明初，亦因“法网稍宽”，致使民间敢于借助滑稽而对朝政加以讽谏。史载洪武年间，有人作画一幅，将它贴在城隍庙的墙上。上绘一个僧人头戴一冠；一个道士头戴十冠，且头发蓬松；又有一断桥，两边各有一位甲士与百姓，立而待渡。其画外之意，僧人戴冠，象征“有官无法”；道士头戴十冠，象征“官多乱法”；军民各立桥边，象征“过不得”。<sup>②</sup>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明代专制虽最称严密，且君主之荒淫亦最无度，但正因为此，才最终导致第一等的思想家，本于良知理性，本于“为民生立命”之悲愿，挺身而出，为人民说话，于是黄梨洲等辈奋然兴起，大辟“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非唯上接孟子“民贵君亲”之古

<sup>①</sup> Chris Bramall and Peter Nolan: "Introduction: Embryonic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in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 (eds.), Li Zhengde, Liang Miaoru and Li Si-ping (tr.), *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 p. xiii, xiv, xviii, xxii.

<sup>②</sup> 冯梦龙纂，刘英民、赵同璧等选注：《古今笑史》第31《口碑部·城隍庙墙上画》，535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

义，亦且下开孙中山、梁启超民治说之先河。<sup>①</sup>

这当然是就明末清初诸多思想大家而言，其实这些思想家激进思想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借着明代中期以后政治环境日趋宽松、言论相对自由而起。

为示说明，不妨将苏轼与李贽两人的经历作一比较，借此以观宋、明政治环境的差异。根据明朝公安派文人袁中道的考察，苏轼为人性无忤害，乐道人善，应该说与世无争无轧。即使如此，还是遭人所忌，加罪于他，使之“萍漂岭海，仅得生还讯”。李贽号称是苏轼在明代的再生，尽管才与趣不及苏轼，而识力不啻过之。李贽为人亦性无忤害，大约与苏轼相同，而其得祸亦依稀相似。究其原因，大抵还是因为两人之舌端笔端，真有触犯世之大忌之处。苏轼、李贽两人经历相同，但生平著作的命运却截然相反。苏轼生平所著，自宿州符下之后，已是半入蛟宫，即使是他临池挥洒之余，为人藏于复壁者，犹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其为奎宿，然后始弛苏文之禁。反观李贽，当其被逮之后，朝廷稍稍禁锢其书，但不及数年，其著作即盛传于世，若揭日月而行。基于上述比较，袁中道得出如下结论：“本朝之宽大，与士大夫之淳厚，其过宋朝也远矣。”<sup>②</sup>这是相当有意思的比较，基本可以说明明代的政治环境相比于宋代，已略显宽松之相。正因为此，海瑞在嘉靖年间，将明世宗的年号“嘉靖”，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sup>③</sup>崇祯年间，民间舆论更是将年号“崇祯”比拟为“重征”，以揭示其横征暴敛。无论是当着皇帝之面，说“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是以“重征”影射“崇祯”，这好比当着和尚的面说“秃驴”是一样的道理，没有不怕死的勇气是做不到的，但由此亦不难发现明代民间舆论的勃盛。

晚明通俗文学的兴盛，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的政治界对于文学的罗网确实最稀。尽管明代的君主对儒臣并不以礼相待，却并

①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

②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3《龙湖遗墨小序》，43~4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

③ 海瑞：《海瑞集》上编《治安疏》，上册，2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不因此而对文人的创作多加钳制，从很多淫褻之作可以在市上的书坊公开发卖，足以证实此事不虚。于是，也就出现了一些很大胆的甚至冲击传统礼教的作品。如许仲琳所作《封神传》，其中如哪吒的逼父，杨戩的反殷，无不都是传统礼教所不容之事，而许氏在小说中却言之津津。<sup>①</sup>

一旦法网稍宽，其结局必是纪纲渐颓。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尤其看重“纪纲”二字。正如宋儒朱熹所言，纲者，犹网之有纲，网非纲不张；纪者，犹丝之有纪，丝非纪不理。由此往外而加以推理，则家无纪纲，则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齐整；国无纪纲，则君不君，臣不臣，国不可得而治理；天下无纪纲，则中国非中国，夷狄非夷狄，天下不可得而太平。可见，纪纲二字是传统政治的核心内容。一旦纪纲颓废，那么就预示着政治失去了清明，甚至说国家在政治领域失去了控制。

晚明的社会，恰恰就是一个“纪纲渐颓”的渐变过程。这个渐变过程，大体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是皇帝对政务的漠不关心，有时甚至是一种对朝政的慵懶情绪。自正德朝以后，明武宗基本是一个只是关心游戏、酒色的皇帝，对上朝不感兴趣。明世宗倒是勤于在深宫修玄，但对朝政似乎也不甚关心。到了万历朝，自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除了对搜刮民财興味盎然之外，对于上朝处理政务，显然也是相当不耐烦，所以对于朝臣的谏奏，一味采用“留中”，聊以搪塞。其结果则造成了官员纷纷不告而去职。<sup>②</sup> 当时的朝政虽不能说已陷于瘫痪，但大体上是一个不死不活的维持状态。其次，皇帝既已懒于政务，那么百官就落得因循守旧。余珊的说法大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状况，即因为承平日久，事乐因循，政多苟简，最终导

---

<sup>①</sup>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60章《长篇小说的进展》，9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sup>②</sup> 据史料记载，万历朝时有一位尚衣监太监陈忠，曾向明神宗进言，称当时是“大僚缺，台谏缺，司礼、东厂缺”，甚至“琼林日积，殿门不建”，实在令人痛心。这基本可以反映万历末年的朝局。说具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4，万历四十年壬子五月三十日条，收入《嘉业堂丛书》，民国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致“名实乖谬，而上下之分未定；官府异同，而陟罚之法未公”。<sup>①</sup> 这好像人得了中风之病一般，手足痿痹不仁，筋骨肌骸不属，行居坐卧，难以屈伸。

为此，有必要对明代的言论加以适当的梳理。明代政治的最大弊端，在于上下相隔。自明代中期以后，官方言路渐趋堵塞。正如明人李承勋所言：“上泽虽布而不得下流，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奉诏宽恤事件，公然废格不行；奉旨蠲免税粮，肆意重复征扰。”<sup>②</sup> 可见，即使是上有行仁政之意，也往往在地方官员的废格不行中，使下面的小民百姓无法得到实惠。这尚属其次，最为可悲的是，皇帝高高在上，民情之苦，无法及时上达。正是从这种角度而言，方才显得言论更为重要。

其实，就明代官方言路而言，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变迁历程。在明初之时，言路甚广，并由科道专任其责，使之封驳诸司，风闻言事，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壅蔽而遏祸源”。其始以三途类选给事中，相当于中书舍人，而御史亦大多仅升各部主事，待科道似乎并不甚重。即使如此，当时却多有直节敢言之士。其后渐重科道之选，至弘治年间，下令从博士、行人、推官、知县、教官中，选拔历练老成者除补科道之官，甚至跻之部属之右，其任职之重比明初加倍，然直节敢言之气，反而不如明初。此为何故？明人管志道已经一语道出：“先朝不重名而重言，故人争奋于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争保其官。”<sup>③</sup>

明代中期以后，为何言官会“重官”甚至“保其官”？盖有其因。大致说来，刘瑾擅政与张居正当政，是明代言路发生重大转变的两个重要分水岭。刘瑾等相继窃柄之后，深忌忠言发己奸私，于是专取一种“软熟易制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互塞言路，蒙蔽主心，以苟图富贵于目前，不顾危亡于旦夕”。一旦有正士稍为触及忌讳，不是远加贬窜，即是痛加捶楚，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已。<sup>④</sup> 刘瑾擅政，直至张

① 余珊：《陈言时政十渐疏》，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67，1696～16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② 李承勋：《论知人安民疏》，载《明经世文编》卷100，881页。

③ 管志道：《直陈紧急重大机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99，4324页。

④ 余珊：《陈言时政十渐疏》，载《明经世文编》卷167，1702页。

居正当政以前，史称其为“讳言之世”，当政者堵塞言路，而言官明哲保身，苟图富贵，不尽言责。自张居正当政以后，史称其为“轻言之世”。<sup>①</sup> 此即明人王锡爵所言：“大抵数年议论，始于相矫，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不为平。彼既不平，此复相矫，前弊虽矫，后议复生，议数更而难穷，法数更而难守，事数更而难睹其效，人数更而难课其成，政事不修，纪纲不振，皆始于此。”<sup>②</sup> 作为当政者之王锡爵，对这种议论自有不满，甚至视其为“政事不修，纪纲不振”的缘由。即使如此，他亦不得不承认，自张居正当政以后，这种言论的勃兴，还是因为“不平”所“激”。

在明末的公共言论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一是追求“国是”“公论”，提升言论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二是“野议”与“朝议”相对立，在野言论日渐兴盛，最终形成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清议”。

就前者而言，明代末年，由于朝局的变化，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国是”，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种见解，细加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虽对“国是”有详细的阐释，但从总体上还是将国是的大权最终归结到皇帝手上，而部分轻视了来自在野士人乃至民间百姓的力量。杨鏊之说无疑是这方面见解的典型。杨鏊认为，国是有定体，无定局。所谓有定体，概言之，即或以缜密为是，或以疏阔为是；或以明审为是，或以含糊为是；或以紧捷为是，或以渐次为是；或以刚割为是，或以隐忍为是；或以振刷为是，或以因仍为是。这是一种千古不易的定体。所谓无定局，概言之，即或古为是，而今为非；或前为是，而后为非；或名为是，而实为非；或常理为是，而寡会为非。这就是说，所谓无定局，就是国是必须随时变通。至于国是之得，或出于皇帝之独断，或出于辅臣之老谋，或通过一些隐君子之上言而

<sup>①</sup> 如钱谦益记载：“江陵以前，为讳言之世。江陵以后，为轻言之世。”参见钱谦益：《牧斋外集》卷3《陈奉常文集序》，载氏著：《钱牧斋全集》，6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按：此说非钱谦益语，而是曾任太常寺少卿一位姓陈之人所言。

<sup>②</sup> 王锡爵：《定国论一政体疏》，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58，497页。

起到拾遗补阙的功能，或由一些虚中之人的不断上言，而使国是得定。而国是之失，“或际夫已穷而不变，或狃于积习而苟安，或决裂于书生之执拗，或厄夺于重臣之专愎，或阴挠于朋党之盈廷，或纷更于噪夫之喜事”。正是从这一点上，杨铎得以看出“有治人，无治法”。所有这些辨析，杨铎终究归于下面的结论，亦即承认孔子所谓的“辨言乱政”。换言之，轻率的言论往往看上去很有道理，似乎可用，其实“谬于时”，不合时宜。<sup>①</sup> 第二类是对“国是”与“国体”“国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在此基础上确立国是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将“国体”“国法”“国是”并列而拟为国家政治构成的三大支柱，这不仅是东林党人缪昌期政治学说的特点，更是以“公天下”为基本内涵的“国是”说的典型。“国体”与“国法”，是“人主之所独”，而“国是”却是“天下之所共”。<sup>②</sup> “国是”是出自群心之自然，而成于众口之同一。换言之，“国是”就是众口一词，以匹夫匹妇的所是所非作为仲裁是非的标准。这种出于人心之自然的公论，即使天子也不能侵夺公卿大夫的公论权利；同样的道理，公卿大夫也不敢侵夺愚夫愚妇的权利。缪昌期“国是”出之匹夫匹妇的主张，作为一种舆论大众化的学说，仅为理论上的假说而已，而事实上他根本不想也不愿将它付诸实践。公论存于愚夫愚妇，并不是真的从愚夫愚妇的口中一一流出。如果公卿大夫不立意见，不逞意气，凭着“率然之偶发”，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代表愚夫愚妇的公论。换言之，公卿大夫可以成为大众舆论的代言人。

所谓“国是”，就是在万殊之事中求得一“是”。一般的见解认为，“国是”可以同时被“上”“下”两层之人操持。在上的君主操持国是，可以成为“诛赏大权”；在下的君子操持国是，则可以成为“予夺之公议”。无论是“是”，抑或“公议”，其根本点必须是“公好恶”。正如明末清初人张怡所言：“得其是，则荡荡平平，可法可传；失其是，则百径千蹊，党同伐异。是以门户乱其官评，阿匡中于士气。不有平衡，

<sup>①</sup> 杨铎：《国是》，载《明文海》卷100，989~990页。

<sup>②</sup> 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1《国体国法是有无轻重解》，收入《乾坤正气集》，清道光二十八年刻、光绪十八年重印本。